

“南北朝体”视域下的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影响*

孙 宝

内容提要 东西魏至周陈文坛具有地域性、流动性和争鸣性的鲜明特质，严羽提出“南北朝体”说，用以概括这一时段文坛的整体性特征。在“后三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徐陵禅代撰作主要分为政务性文书与交际性文书两类。前者多为“国家大手笔”，呈现了“南北朝体”宏大叙事的多元手法；后者主要是私人化创作，蕴含了“南北朝体”文人乱世求存的复杂心态。徐陵的禅代撰作作为“东南之秀”的代表，与温子昇、魏收、邢邵等北地名家的文书佳构一起为隋唐树立了定声谐韵的楷则。从“南北朝体”的视域出发，不仅利于以相对宏通的眼光考察徐陵禅代撰作的文体特征和时代价值，也利于发挥徐陵禅代撰制的样本功能，借以揭示南北朝后期文坛的南北融通与一体化趋势。

关键词 徐陵 禅代 《三国典略》 “盲书” “南北朝体”

梁、陈易代的动荡时局，为徐陵后期的文格丕变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此期间，徐陵诗作减少^①，而侧重骈文方面的撰作。清人吴兆宜《徐孝穆集笺注》卷六专列“禅代诸制”一类，徐文炳补辑《徐孝穆集笺注卷六备考》，也对徐陵的禅代撰作予以特别关注。有关徐陵此类创作的文学价值，历来评价呈两极分化：一种认为，它们的史料性超过其文学性^②，且难脱美化“南北朝凡九君，皆假唐虞之名行篡窃之举，沿习成风，遂成故事”^③的恶习；另一种，则以《陈书·徐陵传论》、张燮《七十二家集题辞·徐仆射集序》、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陈代文学》等为代表，认为“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徐）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④。徐陵之所以能“颇变旧体”，既离不开在骈文文体层面的创新^⑤，也植根于决定其撰作动机、书写策略、风格求新、传播需要的时代土壤。史学界一般将梁（陈）、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称作“天下再三分”或“后三国”^⑥，文体学史上也曾有学者对此段定名。《沧浪诗话·诗体》在梳理南北朝至唐初的诗体脉络时，依次胪列“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和“唐初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研究”（项目编号16BZW047）阶段性成果。

①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52页。

②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庾与骈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8页。

③ 陈锐《徐孝穆集笺注后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64册，第934页。

④ 姚思廉《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论》，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335页。

⑤ 学界关于徐陵骈文文体艺术特征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较有代表者，如《中古文学史论·徐庾与骈体》（第311页）、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徐庾体：骈文成熟的标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穆克宏《徐陵论》（《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等。

⑥ 王鸣盛编，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天下再三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洪卫中《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体”，并解释“南北朝体”说：“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①由于“南北朝体”介于“齐梁体”与“唐初体”之间，其对应的文学断限应在梁陈至初唐的区间内。严羽按照“以时命体”的思路将其单独命体，符合东西魏、周陈时期南北争鸣的文坛走势。由于徐陵的禅代撰作肇生于“后三国”的历史时空中，且获得了“被之华夷，家藏其本”的南北认同，这在客观上使它们与“南北朝体”之间具有了密切的时代性关联。考察徐陵禅代撰作及其关联事件，不仅有利于辨明徐陵后期诗文的基本风貌，也有助于探讨“南北朝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南北朝后期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行的视角。

一 徐陵禅代撰作与“南北朝体”的关联及其合理性蠡探

徐陵在梁、陈禅代的过程中，除了撰制劝进表、禅位策、九锡文、告天文、檄、议、移文、诏、哀策等政务性文书外，也有启、碑、书、铭、颂、序、墓志等交际性文书。为了方便归纳，这里统称为“禅代撰作”。徐陵早年与晚年的创作风貌差别较大，钱锺书总结说：“摘文振金石之声，怀叹极禾黍之感，庾（信）所寄于诗赋者，徐（陵）则尽见诸文焉。老而更成，徐亦同然，岂始终为台城应教体哉。”^②学界一般将徐陵早年浮靡轻艳的诗文归入“齐梁体”，但对其禅代撰作却少有界定。清人冯班说：“齐梁已来，南北文章，颇为不同，北多骨气，而文不及南。”^③这说明随着北朝文坛迅速崛起，以齐梁为界，“南北文章”已由北地一味地摹习南方迈向南北交争的阶段。换言之，梁、陈以降的南北创作，在历史区间和风格样式的层面都超出了“齐梁体”的涵盖范围。与众多“后三国”作家的情况相近，徐陵的禅代撰作就属于“齐梁体”无法涵纳的类型。诚如前述，严羽率先提出“南北朝体”用以概括“后三国”文坛的总体特征。不过，“南北朝体”属于严羽的自创概念，该体得以成立的客观性基础是否充分？“南北朝体”作为独立文体的内涵是什么？“南北朝体”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作为“诗体”使用，但用以指徐陵禅代撰作的学理性依据何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南北朝体”若单纯按字面来理解，难免会产生与“南北朝”的史学概念不吻合的矛盾，以致郭绍虞、穆克宏等都曾质疑该体是否成立^④，更有学者认为是严羽“辨体”时“区分过细、勉强划类，甚至重叠含糊”的弊病^⑤。为了解决“南北朝体”所存在的史学、文学断限不一的问题，学界还对其时空外延进行拓展。如曾枣庄给“南北朝体”下定义说：“指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诗体。”又因北朝诗与南朝诗“皆以讲究诗律、声病为体”，而认为“南北朝体即齐梁体”^⑥。林文月则认为：“魏、周虽属北朝，但在文风的大方向而论，皆在齐、梁、陈的南朝宫体艳诗之笼罩下，因此南北都无甚分别，而得通称为南北朝体。”^⑦二说固然使“南北朝体”的内涵、外延愈发清晰，但其文学断限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于“南北朝”的史学断限？若与“齐梁体”异名同体，则“南北朝体”介于“齐梁体”与“唐初体”之间的文体意义何在？“南北朝体”成立的前

①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句读作：“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兹认为，严羽旨在凸显“魏周”与“齐梁”以时命体的同等地位，而非以“魏周体”等同于“齐梁体”。严羽论“黄初体”言“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沧浪诗话校释·诗体》，第52页），亦是论黄初与建安的命体方式一致，而非指“建安体”等同于“黄初体”，故此处断句与之不同。

②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1页。

③ 冯班撰，何焯评，李鹏点校《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4页。

④ 《沧浪诗话校释·诗体》，第55页；穆克宏《滴石轩文存》，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⑤ 张连第《严羽和〈沧浪诗话〉》，牟世金等《中国古代文论精粹谈》，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18页。

⑥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下卷《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652—653页。

⑦ 林文月《文字的魅力：从六朝开始散步》，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版，第195页。

提是否在于“南朝宫体艳诗”对南北文坛的笼罩？类似疑问又会接踵而至。

刘师培曾说：“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①在严羽提出“南北朝体”之前，唐人已对包括徐陵在内的“近世文人”进行整体观照。贞观年间，刘孝孙《沙门慧净〈诗英华〉序》说：“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震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韞兹英略，寔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②可见，周隋统一战争不仅实现了关中与“漳滏”“江淮”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一体化文学地理观的形成。刘孝孙将温邢、徐庾、王褒、沈炯等南北文宗作一体对待，正有利于构建唐初大一统的诗史序列^③。唐人也习惯以南北统观的方式评价“后三国”文人。如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说：“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庾，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④上述都可视作“南北朝体”提出的客观性基础。

由此言之，严羽所言“南北朝体”之“南北朝”并非指刘宋永初元年（420）至隋开皇元年（581），而是类似于梁后期至隋唐所惯称的“南朝”“江南”“江北”（或“山东”）“左右邦家”“五代”“三国”等特定概念。如东魏武定五年（547）八月，侯景报高澄书说：“荆、襄、广、颍已属关右，项城、县瓠亦奉江南……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赵、晋足相俸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使仆得输力南朝，北敦姻好。”^⑤侯景口中的“南朝”明显对应的是“江南”“大梁”的南方政权，“关右”以及“燕、卫、赵、晋”自可归入北方政权所对应的“北朝”。《颜氏家训·文章》称：“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⑥颜之推将“江南文制”与“山东风俗”对举，反映了萧梁、北齐文坛的差异。另外，邢邵评论萧愨《秋夜诗》说：“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颜之推又评价卢思道对萧愨的态度说：“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惬。箕毕殊好，理宜固然。”^⑦颜之推所言“箕毕殊好”，潜在地发挥了《春秋说题辞》“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的讖纬观念^⑧。“天文”“星辰”既然对应不同分野与诗歌类型，“箕毕”之喻亦可揭示萧愨与卢思道诗风的南北差异：萧愨为入北南士，诗风清丽流美，多江南柔婉韵致；卢思道师从邢邵，虽间接受到沈约的影响，却“磊落标奇，言不诡随”^⑨，文辞清丽中蕴含健拔之气。再如，《隋书·儒林传序》说：“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⑩所谓“近代左右邦家”，即指东、西魏以来的江左、河洛政权，它们均有重用刀笔之才的风气^⑪。唐初组织专人撰制

① 刘师培撰，程千帆、曹虹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② 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册，第1574页。

③ 傅璇琮、卢燕新《〈续诗苑英华〉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于溯《〈古今诗苑英华〉考》，《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上卷，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④ 《全唐文》卷二二七，第3册，第2291页。

⑤ 李百药《北齐书》卷三《文襄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35页。

⑥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四《文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9页。

⑦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八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册，第2641页。

⑧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册，第856页。

⑨ 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全唐文》卷二二七，第3册，第2290页。

⑩ 魏徵等《隋书》卷七五《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册，第1706页。

⑪ 史载：“自孝昌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李延寿《北史》卷四三《邢昕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册，第1585页）知北魏末即兴起以刀笔取士之风，温子昇、魏收、孙搴、徐之才、王伟等人则在东魏、北齐以笔体致显位。与此同时，“自魏、晋、齐、梁，诏诰皆出于中书令、中书侍郎……至梁武，制造专令舍人掌之”（刘昉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850页）。梁、陈中书舍人一职也多由寒族多才之士出任，周舍、朱异、伏知命等均为其例。

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客观上带动了“五代”史编纂的热潮。像吴兢曾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张询古亦撰《五代新记》二卷，“记梁、陈、北齐、周、隋事”^①。在“五代史”中，“三国”的专史编纂也得到重视。唐人丘悦《三国典略》二十卷，即“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记南北朝事”（《史略校笺》卷四，第115页）。这里的“南北朝事”专对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梁（陈）而言，而非李延寿《南史》《北史》的“南北朝”概念^②。

可以说，梁（陈）、周、齐以及唐代的文学观念、史书纂修均为严羽以整体性眼光审视“后三国”文坛提供了学术框架，也为“南北朝体”的提出提供了历史语境。归纳起来，“南北朝体”包含以下四方面特质：其一，“南北朝体”的文学断限，应以永熙四年（535）宇文泰于长安立元宝炬为西魏文帝而北魏分裂成东、西魏为上限，以开皇九年（589）隋朝灭陈为下限。“南北朝体”与“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以时命体”的概念一样，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时空界限。其二，“南北朝体”的创作主体规模庞大、身份多元，随着周齐、周梁、隋陈兼并统一战争的推进，呈现由东向西、从南到北的地域性、流动性和争鸣性特点。“南北词人”在此期间，“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③，奠定了山东（温子昇、邢邵、魏收、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李元操、魏澹）、关右（庾信、王褒、牛弘、杨素）与江南（徐陵、江总、虞世基、柳玟、许善心）三地争衡的格局^④。其三，在“后三国”军事对峙、由分而合的政治语境下，“南北朝体”的审美风格以宏壮、悲恻为基调，诗赋书写家国流离之悲，政务文书鼓吹割据政权的正统地位，官私信札则发挥折冲樽俎、细诉款曲之用。它们一改“齐梁体”婉丽、浮靡的风习，而使“南北朝体”充满了悲郁、躁动、矜夸、卑伏等复杂而糅集的特点。其四，“南北朝体”植根于河洛、江南不同的地域环境中，是南北两地文坛共同营造的结果。较之产生于江南地理和文化环境下的“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其文质相成、刚柔相济的文体风格更加凸显。正如《北史·文苑传序》对“南北词人之大较”的总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⑤与此同时，“南北朝体”的文人在频繁的南北文学交流中，也表现出刚中有绮、刚对清切的共通性追求，进而为唐代文坛实现融通南北、一体多元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以作为“诗体”概念的“南北朝体”涵纳以骈文为主的徐陵禅代撰作呢？其实，《沧浪诗话·诗体》中的不少概念具有复合性、通约性、灵活性特征，完全可以移作“文体”概念。如“宫体”除了指梁陈诗歌风格外，亦包含骈文、辞赋宫体化的内涵^⑥；“徐庾体”本指徐陵、庾信“文并绮艳”^⑦，因《沧浪诗话·诗体》的采录，反而成为诗体名称。《四六丛话》“凡例”不受《沧浪诗话·诗体》的拘囿，一并将“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列入骈文的范畴，认为诸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⑧；清人侯康“所为文章，仿南北朝体。阮文达辟学海堂课士，赏其文，由是知名”^⑨，足见侯康所仿的“南北朝体”非诗而是骈文。既然“南北朝体”有指称骈文的实例，

① 周天游《史略校笺》卷五，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② 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有感于“宋、齐、周、隋天下参隔”，而“刊究南北事”。李延寿继承父业，撰《北史》，囊括魏登国元年（386）至隋义宁二年（618）的史事；撰《南史》，涵盖宋永初元年（420）至陈祯明三年（589）的史事（参见《史略校笺》卷四，第125页）。

③ 参见《隋书》卷七六《文学传》，第6册，第1730—1731页。

④ 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153、162页。

⑤ 《北史》卷八三《文苑传》，第9册，第2781—2782页。

⑥ 徐艳《“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胡大雷《论“宫体”在南朝各体文字的蔓延——“宫体之文”考述》，《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⑦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一《庾信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册，第733页。

⑧ 孙梅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⑨ 徐世昌等编，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卷一三三，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册，第5217页。

且该体本就脱胎于隋唐史家、文士对东西魏、周陈文坛整体特征的概括，自不可能只作为“诗体”存在，而势必具备诗、文通指的复合属性。徐陵禅代撰制作为“后三国”文坛不可或缺的构成之一，理应在“南北朝体”的涵盖范围之内。“南北朝体”与徐陵禅代撰作之间不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察其时代价值和艺术高度的重要角度。

二 徐陵政务性文书撰作与“南北朝体”宏大叙事的多重面相

如前所述，徐陵通过在梁陈易代之际撰制劝进表、禅位策、九锡文、告天文、檄、议、移文、诏、哀策等政务性文书，奠定了“国家大手笔”的地位。不止徐陵，为了契合“后三国”时期军事征伐、外事宣传、五礼建制等军政需求，北地推崇擅长王言撰制的“一国大才”^①，涌现出常景、温子昇、邢邵、魏收、阳休之、李德林、薛道衡等名家，他们以中央文枢主官身份引领文坛走向^②；与之差不多同时的江南文坛，出自任昉、沈约、裴子野、丘迟、江革、沈炯等名手的政务文书以实用性、权威性和审美性特点，更使沉博绝丽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坛的主调之一。作为蕴生于“后三国”时代土壤中的“南北朝体”，长于宏大叙事可谓是其与生俱来的文体特质，徐陵的政务性文书则是这一特质的集中体现。不过，由于梁末陈初频繁的君位易主，以及虚薄的国势，都使得徐陵在撰述时底气不足，全然没有温子昇“足以陵颜辄谢，含任吐沈”、魏收“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的豪壮乃至骄矜之态^③。正是在北强南弱的政治语境下，徐陵无法照搬魏晋、南朝旧有的叙事套路，而不得不偏离“建康天下观”来趋附北朝的华夏正统论，在禅代撰制中寻求调和南北正统观的均衡叙事。这就使其政务文书呈现出与魏晋以来宏大叙事不同的变相，进而为“南北朝体”加入了独特的叙事理路。

梳理阮籍、潘勖、卫觊、傅亮、王俭、任昉以及邢邵、魏收等人开国文书的撰述情况，不难发现其易代文作大多围绕开国新君一人展开批旧颂新、佐命中兴的政治叙事。徐陵则不然，他自北齐南返后，相继参与或主导了萧渊明、萧方智、陈霸先的禅代文书撰制，出于务实权变的需要，其在禅代文书中的立场转换频频堪称六朝之最。加之陈朝草创之际曾与北齐结盟，并自比“小国”而“愿预藩臣”“永申藩礼”^④，由此造成了北齐文坛轻视陈朝的优越心态。《三国典略》载：“齐主尝问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⑤可见，即使尹义尚称徐陵“军书愈疾之制，碑文妙绝之词，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⑥，但在北齐官方文界的眼中却不过是“亡国之才”。此后，以“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著称的傅縡奉命出使北齐^⑦，向负责对接的薛道衡赠诗五十韵，尽管傅、薛唱和得到“南北称美”，但魏收却仍调侃道：“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⑧这正说明南北政治军事差距决定了陈朝在文化输出方面的被动地位。因此，徐陵在禅代文书中不得不运用褒扬北朝、重塑帝统的叙事策略，时时流露出魏晋以来国书中绝无仅有的卑从口吻。即便只与温子昇、邢邵、魏收、李德林、薛道衡等北地作家的诏册檄移、章表奏议相比，徐陵的相关撰作也属于“南北朝体”中罕见的“变调”。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① 《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7页。

② 参见拙文《王言撰制与魏、齐文运承变》，《华侨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③ 《北史》卷八三《文苑传》，第9册，第2785页；《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9页。

④ 徐陵撰，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卷七《为陈武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册，第749、751页。

⑤ 《太平御览》卷五八五，第3册，第2638页。

⑥ 尹义尚《与徐仆射书》，《徐陵集校笺》卷八附，第2册，第885页。

⑦ 《陈书》卷三〇《傅縡传》，第2册，第405页。

⑧ 《隋书》卷五七《薛道衡传》，第5册，第1406页。

其一，主权降格、美化北邦的非正统心态。南朝虽偏据东南，却始终以中原正朔自居。尤其在外交、国典、军事等重大场合，南朝历代多以“受命之主，系天而王。……内蕃国朝，外镇天下”的中央天下观作为礼政实施的基本出发点^①。户川贵行指出，刘宋孝武帝在建康设明堂，以扬州六郡为王畿，定霍山为“国镇”，试图缔造以建康为天下中心的观念。这不仅为梁武帝开创的南朝天下观奠定了基础，也在南朝逐步确立起江南即中国、中原为索虏的华夷观^②。受此影响，王僧辩在梁末坚持认为虽然荆陕诸州沦陷，长江天堑仍为东南建国的屏障，即使没有北齐的军援，金陵政权同样“中兴可待”^③。相反，徐陵与萧渊明受北齐的卵翼而南归，必然要消除江南世族对于北齐的“索虏”认知及敌国定位。徐陵在劝诱王僧辩的系列文书中，强调北齐“仁信之风，覃于万国”的正统性，将北齐的军事干预美化为“清我寇仇”“兴亡继绝”^④的必要手段；对萧渊明投靠北齐的政治行径，也曲解为重振自家“丘陵”“宫庙”而不得已的选择^⑤。总之，徐陵当时已摒弃了刘骏至萧衍构建的“建康天下观”，而从务实层面将萧渊明政权降格为北齐的附庸。考虑到陈霸先掌权之初不得不“请称臣于齐，永为蕃国”^⑥，并与北齐于历阳会盟，这说明徐陵谄附北齐的言论实为时势使然。

其二，标举“尧唐启国”说、“金陵王气”说，在陈、齐、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寻求政治生存空间。为了摆脱陈朝建国“政治合法性资源上极为缺乏”^⑦的困境，徐陵承担起建构建康政权合法性、正统性的使命。他并未完全跳出六朝禅代诏册的主要框架，仍然遵循五德终始论，由梁为火德推导出陈为土德、其色尚黄的国色论。此外，他又在政治话术、逻辑自洽性等方面有所革新。太平元年（556）九月以来，随着陈霸先称帝步骤加快，徐陵借鉴齐梁易代之际萧衍相关诏册的思路，对陈霸先的历史使命、政治角色、天命属性展开全方位塑造。如徐陵《封陈公诏》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帝誉娶陈锋氏女而生放勋（即帝尧）、尧二女于妫汭嫁于帝舜，鼓吹陈霸先远承“重华大圣，妫汭惟贤”^⑧的神圣宗脉；《广州刺史欧阳颍德政碑》“我皇帝从唐侯以胤国”、《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皇帝以陶唐启国”^⑨，均宣扬尧为陈朝帝系之源；《九锡文》则综括陈霸先“大造”及“再造于皇家”的“光启中兴”之功，又历数其自大同年间崛起于岭南（平定孙罔、卢子雄岭南叛乱，平定李贲交州、爱州之乱）以来的二十一项功绩^⑩。其中“六延梁社”（交广、湘赣、建康、吴郡、会稽、淮南等六次战役）与“十翦强寇”（扫平孙罔、卢子雄、李贲、侯景、杜龛、任约、王僧辩、张彪、萧勃、王僧智），不仅是陈朝开国叙事的核心内容，更是确立陈霸先军事政治地位的话语基础。徐陵还宣扬“金陵王气”说，为陈朝定都建康张目。在堪舆家看来，“东南王气”是呈现于斗牛之间的黄旗紫盖状的云气^⑪。孙权为与魏、蜀争衡，即大力操弄“金陵王气”说，以此掩饰其偏离华夏地理中心的劣势。徐陵受孙吴政权相似军政处境的启发，将之发展为陈朝立国的理论根基，如其《太极殿铭》云：“夫紫盖黄旗，扬都之王气长久；虎踞龙蟠，金陵之地体贞固。……吴都佳气，乃元皇而斯宅。”^⑫

① 胡综《请立诸王表》，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920页。

② 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礼制改革同建康天下中心观之关系考论》，《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③ 王僧辩《答贞阳侯书》，《徐陵集校笺》卷六附，第2册，第632页。

④ 《徐陵集校笺》卷六《为贞阳侯与太尉王僧辩书》，第2册，第600—601页。

⑤ 《徐陵集校笺》卷六《为贞阳侯答王太尉书》，第2册，第635页。

⑥ 李延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册，第1273页。

⑦ 牟发松《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⑧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第1册，第14页。

⑨ 《徐陵集校笺》卷九，第3册，第1083、1115页。

⑩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第1册，第15页。

⑪ 孙英刚《“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

⑫ 《徐陵集校笺》卷三，第1册，第175页。

太极殿为南朝宫城正殿，是君主即位、宣读时令、宴集百官、国葬停灵等皇家仪典的举行场所，也是“扬都王气”钟聚的建筑符号。陈霸先于太极殿即位，自是对梁、陈“王气”转移正式达成的宣示。

当然，徐陵上述政务性文书主要撰作于梁末陈初，诸多迥异于魏晋、齐梁禅代撰制的表述，正是太清之变以来江南政权夹缝求存的真实记录。这些叙事已非对前代“一个八寸三帽子，张公带了李公带”^①的内容的蹈袭，而是徐陵在固有程式上调动历史事件、政权更迭、典章故事的知识储备，加入对五德终始、皇权正统等的融通式说解，这些都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个人化特征。至于属词比事、条分缕析等方面的“叙事之工”^②，更是他戛戛独造的反映。因此，尽管徐陵使“南北朝体”的宏大叙事出现了变奏，但蕴含其中的匠心也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徐陵针对陈朝五礼制度、皇权文化而撰作的系列文书，丰富了“南北朝体”的题材来源、主题类型和表现方式，又使之显露出汉晋以来庙堂撰制所共有的雍容雅正的气象。与庾信入北后积极推动北周礼乐建制的进程一致^③，徐陵渐执权柄后，成为陈朝《五礼仪注》实施的重要参议者与监督者。徐陵以国家大手笔建构陈朝政权话语主调与皇族孝义文化，文风逐步向“华实相扶，情文兼至”^④的境界嬗进，并对唐代政务文书的撰制产生深远影响。如天康元年（566）四月陈蒨去世，徐陵奉敕撰《陈文皇帝哀册文》。其未采纳沈文阿所主的皇庭遣祭之际哀册文中应明确先帝的谥号的意见，而是遵从晋宋哀册称“大行皇帝”的传统，并确立了哀册文的格式，即先言先皇去世之日，称先皇为“大行皇帝”；次言新皇送葬的悲痛之情，称新皇为“哀子嗣皇帝”；最后为哀辞内容。这种哀册文只言“大行皇帝”的处理方式，大概因为先帝庙号、谥号已体现在哀册文的标题中，无须重复称述，同时也顺应了陈朝新君即位诏称先皇为“大行皇帝”的惯例。初唐的君主哀册文沿袭了徐陵确立的陈朝定式，虞世南《唐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褚遂良《唐太宗文皇帝哀册文》即以“大行太上皇”或“大行皇帝”称先皇^⑤。直到唐末，徐陵的“大手笔”仍被奉为王言典范。唐僖宗李儂赞誉萧遘“将徐、庾之事业，尤润帝谟”^⑥，就间接说明了这一点。明人袁黄曾说：“四六盛于六朝，然皆风烟月露之词，于政事礼乐、典章文物之体未备也。”^⑦显然，袁氏并未措意包括徐陵在内的“后三国”作家撰作的政务文书，遑论考察“南北朝体”作为国家大手笔的文体属性了。

三 徐陵交际性文书撰作与“南北朝体”的乱世深描

在齐梁易代之际，徐陵还撰有不少启、碑、书、铭、颂、序、墓志等交际性文书。它们具有更强的私人化写作色彩，却因“宦成梁朝，命存乱世，冒危履险，百死轻生”^⑧的人生遭际，而与太清变乱之前萧梁文坛以抒发个体感怀为主的休闲“小文”^⑨不同。至如颜之推、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人，亦屡遭战乱，更不乏流离琐尾的怨慨。这些都为“南北朝体”增添了沉痛而充实的历史底蕴，也使之在书写“后三国”时代的乱世苦难、亲友情谊、人生浮沉、宦海斗争的过程中，具有了描绘细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0页。

② 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③ 参见拙文《北周射礼及其文学建构》，《文学遗产》2020年第4期。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276页。

⑤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三五，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6册，第4406—4407页。

⑥ 李儂《萧遘罢判度支制》，《全唐文》卷八六，第1册，第905页。

⑦ 袁黄撰，黄强、徐姗姗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续编》卷五，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⑧ 《陈书》卷一九《沈炯传》，第2册，第254页。

⑨ “小文”是萧梁休闲文字的代称，参见伏挺《上徐勉书》（姚思廉《梁书》卷五〇《文学传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720页）、刘孝仪《叹别赋》（《艺文类聚》卷三〇，上册，第531页）。

赋、反省痛彻、以小见大的个体化视角。仅就徐陵交际性撰作中的信札来说，其中颇多事、情、理、辞兼美的典范之作。它们不仅记叙了徐陵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也在南北政治军事剧烈博弈的时代条件下，折射出徐陵对外融通南北、对内黜浮守正的文化业绩和幽微心曲。

首先，徐陵涉及外事交往的私人信札，展现了南北文坛高水平互动和深层次融通的特征。徐陵在太清二年（548）出使北齐，由于建康沦陷而不得不在北滞留七年。为了早日南返，徐陵作《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其“隶事工而论事畅”，“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折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历来被视为徐陵文集的压卷之作^①。徐陵南还之后，或因公务，或因私交，仍与一些北地文士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已形成开头寒暄、恭维对方、回顾情谊、勤勉联络的“套头”，瞿兑之就以徐陵《与李昶书》为例，认为是当时“书札的款式，已渐有定律”的体现^②。另外，与徐陵有书信往来的北人作品也保留在《徐陵集》中。因其文采斐然，孙梅甚至怀疑：“案：李那、尹义尚二书，并附见《徐孝穆集》。辞旨抑扬，才情辨博，岂孝穆实润饰之欤？不然，何朱蓝之不远也？”^③孙梅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李昶（按，小名那）虽在北周负责诏册文笔，但常说“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因而其“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④。《徐陵集》所载李昶书信是整饬有法的四六体式，辞情雕琢，与徐陵风调接近，显然不是“了无稿草”所能达到的效果。然而，正如徐陵《与李那书》所说，北周治御正殷不害使陈期间与其“常在公筵，敬析名作”，继而将李昶《陪驾终南诗》《入重阳阁诗》《荆州大乘寺碑文》《荆州宜阳碑文》予以传示，由于李昶诸诗已有庾信《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等和作，那么自是能代表北周本土作家水平的“名作”。因此，徐陵称誉李昶“铿锵并奏，能惊赵鞅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当非虚语。此外，徐陵还称道李昶诸作在建康造成的轰动，说：“京师长者，好事才人，争造蓬门，请观高制。轩车满路，如看太学之碑；街巷相填，无异华阴之市。”^⑤由此，足见陈朝主流文坛也开始对北周文学进行“逆向”追捧。总体来说，徐陵与杨愔、李昶、尹义尚、殷不害等人交往的书信风格已高度趋同，他们促进了南北文人群体的深入交流，也有助于推动南北文风一体化的进程。

其次，以《与顾记室书》为代表的友人信札，翔实记录了徐陵入陈之初最大的一次仕路危机，也集中反映了“后三国”文人乱世求存的焦虑与怨愤。《南史·陈暄传》载：“（陈）暄以落魄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陈天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向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竟无忤容。作书谤陵，陵甚病之。”^⑥由于徐陵以四万钱购置徐枢私宅，随之徐枢又出任尚书郎，陈暄就将二事联系起来，写匿名信构陷徐陵卖官鬻爵。徐陵随即下狱，不得不作《与顾记室书》，恳求友人“顾记室”向其府主“殿下”辩白冤情。徐陵在信中自辩说：“徐领军节度自启（徐）枢为郎，敕付选序，吾既不启据，又不为选职，所可相关，止是得中侯相闻为呈启而已。以此见罪，一何冤滥。”^⑦吏部尚书作为“选职”是六朝的通行说法。既然徐陵自称“不为选职”，则其时不为吏部尚书甚明。加之信中“近者既居台辖，唯务奉公”句，也说明徐陵当时并不是吏部尚书。“台辖”为尚书省纲纪之官，亦即尚书左丞。其虽有一定的人事荐举权，但主要掌管省内及朝廷官员风纪考劾，故南

①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册，第1473页。

②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等《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6页。

③ 《四六丛话》卷三一《作家四·尹义尚》，第629页。

④ 《北史》卷四〇《李昶传》，第5册，第1467页。

⑤ 《徐陵集校笺》卷八《与李那书》，第2册，第830页。

⑥ 《南史》卷六一《陈暄传》，第5册，第1503页。

⑦ 《徐陵集校笺》卷八，第2册，第937页。

北朝又以“枢辖”“左辖”为之代称^①。另外，信中自称：“行年六十，无复侪俦，非意余生，忽此诬谤。”^②“行年六十”，指即将六十。若按照《南史》将陈暄“盲书”事件系于“陈天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之时，则与徐陵的生平行实不符。因此，《与顾记室书·题解》依据信中“去年正月十五日，尚书官大朝”句，推定事件发生在光大元年（567）正月，徐陵作书时间则为光大二年（568）。不过，此年徐陵已六十一岁，与“行年六十”不合。故《题解》认为：“‘行年六十’，或指成数，抵牾之处，已难究诘。”^③其实，上述“抵牾之处”完全由《南史》史臣误将尚书左丞作吏部尚书使然。

萧渊明于天成元年（555）即位，以徐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同年，陈霸先率兵诛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帝。任约、徐嗣徽乘虚攻打石头，徐陵则感戴王僧辩旧恩，投降任约。绍泰元年（555）十二月任约被平后，陈霸先未追究徐陵罪责，以之为贞威将军、尚书左丞。永定元年（557）十月陈霸先即位，徐陵又在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的基础上加散骑常侍，尚书左丞如故，直至天嘉初迁太府卿。可见，徐陵担任尚书左丞大致在绍泰元年年底至永定三年（559）间。至于“顾记室”，盖指顾野王，“殿下”则为陈蒨。永定元年十一月，陈霸先大封宗族诸子。在所有宗室成员中，陈蒨最为陈霸先赏识，所谓“王业艰难，赖乎此子，宜隆上爵，称是元功”^④。陈蒨于该月封临川王，继而拜侍中、安东将军。由于同年周文育、侯安都遭遇沌口之败，陈蒨又奉命镇守南皖。这正与徐陵信中“殿下德高两猷，风美二南，亿兆归心，衣冠有托……伏见军戎多务，所以不敢祈冒”^⑤相合。据《陈书·顾野王传》，陈初顾野王出任陈蒨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则其任职当在永定元年十一月之际。由此可推定，“盲书”事件只能发生在永定元年十一月至永定三年四月之间。由于《与顾记室书》载陈暄“去年正月十五日”大闹尚书省，则符合条件的就只有永定二年（558）正月十五日，《与顾记室书》自当写于下一年的永定三年。是年徐陵五十三岁，故信中称“行年六十”。早在中大通年间，徐陵就曾因御史中丞刘孝仪风闻其赃污而奏免上虞令；加之依附王僧辩、参与任约叛乱，自然不为朝廷深信。故在陈暄诬告后，朝廷未经查实，就发生“南司检问，了不穷推，承训劾为信言，致成隳免”^⑥的冤狱。永定三年，陈霸先日益病重，渐将政务移交陈蒨处理。徐陵为了申明冤屈，只得依托陈蒨府吏顾野王加以申诉。在顾野王的斡旋下，徐陵不仅免罪，还于天嘉初任太府卿。此后，徐陵在天嘉年间历任五兵尚书，领大著作、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并弹劾陈頊，为朝野敬服。天康元年（566），徐陵又迁吏部尚书，至此担任“选职”，“众咸服焉，时论比之毛玠”^⑦。徐陵在吏部廉洁强项的形象可能掩盖了陈初担任尚书左丞的经历，故《南史》将陈暄“盲书”事件误系于徐陵出任吏部尚书时。

以上考述《与顾记室书》的写作时间、徐陵被谤时的身份，旨在说明徐陵在入陈之初深受朝廷猜疑的政治处境。徐陵蒙冤下狱后，只能寄望于友人施以援手。由信中“弟与吾游眷，亟回星纪，故人如此，宁不矜叹邪”^⑧，知徐陵与顾野王交往久而深。徐陵在信中疾呼“此事冤枉，天下所无”，并渴盼“一蒙神鉴，照其枉直，方歿幽泉，无恨灰壤”^⑨，其悲酸愤懑之情溢于言表。若以之与沈炯《请归养表》、卢思道《劳生篇》、颜之推《观我生赋》对读，可勾勒出“南北朝体”文人在变乱中不平则鸣、据理奋争的群体图景。而元稹所言“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⑩，当忽略

① 尚书左丞称“枢辖”见《北史》卷四〇《高道悦传》（第5册，第1468页）；称“左辖”，见《隋书》卷六三《元寿传》（第5册，第1498页）。

②⑤⑧ 《徐陵集校笺》卷八，第2册，第937页。

③⑥ 《徐陵集校笺》卷八，第2册，第936页。

④ 《陈书》卷二《高祖纪下》，第1册，第34页。

⑦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第2册，第333页。

⑨ 《徐陵集校笺》卷八，第2册，第936—937页。

⑩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600页。

了“南北朝体”文风中恻郁深沉、情辞老到的一面。如果从政治功能角度可以断定“南北朝体”具有宏大叙事的文体属性，那么从个体角度来说，它又具有直面动荡苦难而深描作家心灵史的特征。

四 徐陵禅代撰作的影响路径与“南北朝体”在唐代的衍传

尽管“南北朝体”的创作主体范围遍布南北，却不是各路作家文风的杂烩，它是对魏齐、周陈文运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的概括，理应代表这一时段最为主流且典型的文学特征。前引《北史·文苑传序》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就较全面地揭示了“南北朝体”的主体风格。对于徐陵而言，他不仅以禅代撰作树立起典正清绮的楷则，还通过多种方式，确保这种风格占据陈初文坛的主流，并稳健而持续地向唐代传播。总结起来，它们分为三种路径：

第一，运用东宫师傅的身份，督促太子远离“狎客”文习。自天康、太建以来，徐陵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太子少傅，可谓集揆宰之职与文宗学府于一身。基于“盲书”事件的教训，徐陵自不会主动奖掖、拔擢陈暄之徒。经过一番沉寂后，陈暄于太建元年（569）陈叔宝被立为太子之际，与王叔达、孔范、袁叔、王瑳、陈褒、沈瓘、王仪等人以文才入选为东宫学士，并因“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谑，语言不节”，成为陈叔宝最“亲昵”的“狎客”^①。徐陵在大力建构陈朝全新的正统品格与皇权文化过程中，突出太子之德国运攸关的关键属性。其《皇太子临辟雍颂》云：“皇太子耀彼重离，光慈七鬯，仪天以行三善，伋极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国；乃武乃文，化成天下。”^②正因如此，徐陵对陈叔宝接近“狎客”颇有微词。史载：“初，后主为文示（徐）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③所谓“不成辞句”，接近于不像话、不成体统之义。事实上，陈叔宝文笔真率自然，其《与詹事江总书》曾被誉为“直抒胸臆，全不雕琢。由气格清华，故无一笔生涩”^④。然而，陈叔宝终究偏好“浮艳”文风^⑤，徐陵贬斥其“不成辞句”的文作大概就属于这一类。陈叔宝还刻意追求东宫的宽松环境，于太建八年（576）六月提出由左民尚书江总升任太子詹事。由于太子詹事在梁、陈时期“任总宫朝”^⑥，尤其掌管东宫人事权，故徐陵寄语江总说：“桓经既受业，贺拜且尊儒。……沟水惭雄伯，漳川仰大巫。鲍鱼宁入俎，钓鳖匪充厨。叔誉恒词屈，防年岂滥诛。”^⑦诗中“桓经”（桓荣）、“贺拜”（贺循）等东宫名师激励江总，又以“鲍鱼宁入俎，钓鳖匪充厨”句表明宫职择取的高标准。这一标准体现了徐陵“提举纲维，综核名实”^⑧的铨任原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东宫文士群体良莠不齐的诫谕。

第二，以典正清绮作为荐拔、铨选的标准，通过大力汲引后进，在促进“南北朝体”南方群体壮大的同时，也促进了典正清绮文风向唐代的传续。徐陵在担任尚书省主官期间，就注重通过铨选途径来改良文坛人员结构。其所选荐之士，大都为人地兼美、才学俱佳者。如徐陵欣赏姚察“流瞻”“绮密”的文史制述之才，自称“吾弗逮也”，并叮嘱其子徐俭：“姚学士德学无前，汝可师之也。”^⑨阴铿博涉史传，以五言诗见称。徐陵推荐其参与宫宴雅集，陈文帝“使赋新成安乐宫，铿授笔便就，世

① 《南史》卷六一《陈暄传》，第5册，第1503页。

② 《徐陵集校笺》卷二，第1册，第209—210页。

③ 《南史》卷六二《徐陵传》，第5册，第1525页。

④ 许榭评选，黎经浩笺注《六朝文絮笺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⑤ 《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第2册，第347页。

⑥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〇《职官一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第823页。

⑦ 《徐陵集校笺》卷二《同江詹事登宫城南楼》，第1册，第153页。

⑧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第2册，第332页。

⑨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第2册，第353、348、354页。

祖甚叹赏之”^①。《新成安乐宫》属乐府瑟调曲辞，萧纲曾有所作，“备言雕饰刻斫之美”，颇见宫体风调；而阴铿拟作中“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鸱仰，联翩贺燕来”诸句^②，则有辞气警健、物象生动之貌。虞世基早年与其弟虞世南师从顾野王，因博学有高才，徐陵不仅誉之为“当今潘、陆”^③，还将弟女许配虞世基。虞世基深受徐陵禅代诸制典正文风的影响，所撰《讲武赋》弘扬“我大陈之创业，乃拨乱而为武。……于是礼畅乐和，刑清政肃”的军礼意义，鼓吹陈蒨“实皇王之神武，信荡荡而难名”^④的帝德。这些关于春蒐骑射政治功能的阐释，正是徐陵塑造陈朝政权合法性及皇室文化权威性的有力补充。虞世南“文章婉缛，慕仆射徐陵，（徐）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入唐后作《圣德论》《康国献狮子赋》，多有规讽补益。虞世南曾谏止李世民仿作宫体诗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⑤所谓“雅正”，正与徐陵晚年的文学崇尚相符。褚亮十八岁，“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⑥，可知其得到了徐陵认可。贞观中，褚亮自赞“道高业峻，神气清远。学总书林，文兼翰苑”^⑦，亦是徐陵“学”“文”结合观的体现^⑧。可见，徐陵通过荐举有相同审美旨趣的后进文士，推动了陈隋、唐初文坛典正清绮一脉的传承。

第三，以旧为新，促进北齐至唐代骈文的发展。徐陵为文素以“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⑨著称，其新变特征之一即变造典实、以旧为新。如李百药幼时参与其父李德林与陆义、马元熙等人组织的雅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邠人藉稻”。杜预《注》云“邠国在琅邪开阳。”’又等大惊异之”^⑩。宋人马永卿分析说：“今按，昭公十八年传，‘邠人藉稻’，注云：‘邠，妘姓国也。其君自藉稻，盖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经，书‘邠人入邠’，注云：‘邠国，今琅邪开阳县也。’盖藉当呼为典籍之籍，谓履行之，而记其数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为刈，非也。”^⑪撇开“藉稻”词义的训解歧说，徐陵以“刈”字替换“藉”字而成句，无疑是其“缉裁巧密，多有新意”的典型例证。李百药在幼年即能指明徐陵文中的典源，足见李昶《答徐陵书》所言徐陵撰作“久以京师纸贵，天下家藏。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⑫，堪称实录。李百药入唐后，相继作《封建论》《赞道赋》《帝京篇》，被李世民誉为“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⑬。所谓“意之新”，或许离不开徐陵“多有新意”的启蒙之功。徐陵的碑颂之作对唐前期文坛也多有影响。史载，武周时期在富嘉谟、吴

① 《陈书》卷三四《文学传》，第2册，第472页。

②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一三》作“新城安乐宫”（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565页）。

③ 《北史》卷八三《文苑传》，第9册，第2797页。

④ 《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第6册，第1570、1572页。赋文有“鹑火之岁，皇上御宇之四年”（《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第6册，第1570页）句，据《隋书·王劼传》“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午为鹑火，以明火德”（《隋书》卷六九《王劼传》，第6册，第1602页），知“鹑火之岁”为北周保定二年、北齐河清元年，亦即陈蒨天嘉三年（562）。陈蒨于永定三年六月即位，故至此正为四年。

⑤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二《虞世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册，第3969、3972页。

⑥ 《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第8册，第2578页。

⑦ 褚亮《十八学士赞》，《全唐文》卷一四七，第2册，第1486页。

⑧ 如徐陵《晋陵太守王劼德政碑》不仅赞誉琅琊王氏“网罗图籍，脂粉艺文，学侣挹其精微，词宗称其妙绝”的族风，还褒奖王劼“学则经笥，文为世珍”（参见《徐陵集校笺》卷九，第3册，第1161页）。

⑨ 《陈书》卷二六《徐陵传》，第2册，第335页。

⑩ 《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第8册，第2571页。

⑪ 马永卿撰，崔文印校释《懒真子录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6页。

⑫ 《文苑英华》卷六七九，第5册，第3501页。

⑬ 《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第8册，第2577页。

少微“以经典为本”的“富吴体”出现之前，“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①，即为显证。

从“南北朝体”的视角出发，徐陵禅代撰作是推动该体在唐代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唐人眼中，徐陵的禅代撰作往往与庾信的骈文名作紧密联结，成为当时科举应试之前锤炼骈律、摹习辞章的范本。如牛希济《文章论》批判“唯声病忌讳为切，比事之中，过于谐谑”的科场习气，主张“今朝廷思尧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经之儒，居燮理之任”^②。所谓“徐庾之学”，正说明徐陵、庾信骈文的撰作技巧、风格样式已成为唐代科场中的专门之学。不仅如此，唐人还习惯将徐陵禅代撰作与北朝后期名家名篇并提，体现了将东魏、北齐、北周、陈朝文坛作等量齐观的一体化思维。《文镜秘府论》分析“鹤膝”说：“吴人徐陵，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其诸手笔，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复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须鳞次避之。温、邢、魏诸公，及江东才子，每作手笔，多不避此声。……诸公等，并鸿才丽藻，南北辞宗，动静应于风云，咳唾合于宫羽。……后进之徒，宜为楷式。”^③文中不仅详细分析徐陵的“文笔”法度，还遍举温子昇《广阳王碑序》、邢邵《老人星表》、魏收《赤雀颂序》的精言秀句，以为唐人撰作提供楷则。此外，《文笔式》列举温子昇《寒陵山碑序》、邢邵《高季式碑序》、魏收《文宣谥议》、任孝恭书、徐陵《劝进表》《定襄侯表》等篇的名句，并以“看徐（陵）、魏（收）二作，足以知之”“徐以靡丽标名，魏以宏壮流称，观于斯文，亦其效也”^④等加以总结。《文镜秘府论》以徐陵与“温、邢、魏”作为“南北朝辞宗”的典范，无形中触及了“南北朝体”文人构成的论题。上述以整体性眼光揭示“温、邢、魏诸公”与“东南之秀”“江东才子”对唐代骈文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是“南北朝体”在唐代衍传的客观写照。

综上所述，文学笔墨当随时代而变，文论领域自应适时提炼、中肯抉发，而不致将文坛演进的重大节点置于“盲区”之中。严羽“南北朝体”说可谓别具只眼，一经提出，就在宋至明清文论批评中产生一定影响。如南宋赵蕃《章泉诗法》、明费经虞《雅伦·体调》、清王文清《考古略·骚赋七诗体考略》等均加以沿用，明吉水周《诗学梯航》甚至在“南北朝体”后增列“六朝体”，并解释说：“通南北朝、隋言之。”^⑤毋庸讳言，“南北朝体”的确切意涵、适用范围、文体“合法性”等问题，迄今仍有争议。这里尝试还原严羽所遵循的以朝代命体的时序逻辑，认为他在唐人正史、集序所论的基础上提出“南北朝体”，意在将“后三国”的特定时段单独命体，从而体现对南北朝文坛重要阶段均有文体命名的贯通性思维。“南北朝体”具有植根于“后三国”时局动荡、南北交争的时代属性和文化内涵，在众多的“后三国”文人群体中，徐陵及其禅代撰作无疑是透视“南北朝体”内涵、特质的重要样本。徐陵的政务性、交际性撰作能够揭示“南北朝体”较之魏晋以来开国文书的叙事变相，也彰显了该体潜藏于南北外事文书、友人信札之中的人事挣扎与乱世情怀。换言之，从“南北朝体”的视域出发，也利于以相对宏通的眼光考察徐陵禅代撰作的文体特征和时代价值，进而跳出徐陵禅代撰作的个案限制，南北合观，为探讨南北朝后期文坛的南北融通与一体化趋势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

[作者简介] 孙宝，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发表过论文《北周射礼及其文学建构》等。

(责任编辑 李 科)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传中》，第15册，第5013页。

② 《全唐文》卷八四五，第9册，第8878页。

③ 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册，第981页。

④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西卷《文笔十病得失》，第3册，第1253页。

⑤ 吉水周《诗学梯航·辨格》，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册，第91页。